

谴责小说的当代创作形态及主题拓展

——以李洱的《应物兄》为例

熊 辉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李洱的《应物兄》出版以来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肯定,其对现实生活各个侧面的“勘探”和批评毫不逊色于晚清谴责小说,可被视为当代谴责小说创作的高峰。李洱在作品中回避了鲁迅诟病谴责小说内容不真实的弱点,不仅丰富了该类小说的叙事艺术,而且还拓展了谴责小说的主题,把批判的矛头从官场和商界扩展到高校领导、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中国式的学者迎合以及佛门圣地,彰显出小说对现实社会“谴责”的深度和广度,为以后该类型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诸多经验。

关键词:《应物兄》;当代谴责小说;学术腐败;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24)12-0001-09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24.12.001

Contemporary Creative Forms and Theme Expansions of Condemnation Novels: Taking Li Er's *Elder Brother Ying Wu* as an Example

XIONG 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Elder Brother Ying Wu* by Li Er has won a high recognition from its readers and critics since it was published. There is no less "exploration" and criticism of all the aspects of real life in *Elder Brother Ying Wu* than in condemnation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 *Elder Brother Ying Wu* is regarded as the peak of contemporary condemnation novels. Li Er avoids Lu Xun's criticism of the weakness that condemnation novels' contents are untrue. Li 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narrative art of condemnation novels, but also expands the themes of such novels, and extends the objects of criticism from officialdom and business to university leadership,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cademic research, Chinese-style scholars' catering and Buddhist holy land, highlight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condemnation" of real society, and providing a lot of experiences for creating such novel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lder Brother Ying Wu*, contemporary condemnation novels, academic corruption, narrative art

收稿日期:2024-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21&ZD258)。

作者简介:熊辉(1976-),男,四川邻水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

从小说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讲,当代文学史上的新写实派小说、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可以视为谴责小说的新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很多新兴行业的崛起导致腐败和堕落行为的进一步漫延,而对这些领域的批判和谴责不仅是小说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且给谴责小说题材的拓展带来了新的可能。《应物兄》在继续批判官场和商界之外,还对高校行政、学术界、寺庙等方面展开了批评,是对以往谴责小说、社会小说或反腐小说批判内容的丰富,进而将该类小说的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

—

“谴责小说”是根据作品内容和社会功能命名的小说类型。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谴责”功能的作品一直存在,及至到了当下也有不少作家通过自身创作承续了谴责小说的批判性特征。

晚清时期,人们将四大谴责小说划分到“社会小说”或“历史小说”的行列^[1],并未出现“谴责小说”的概念,因而鲁迅开风气之先最早命名“谴责小说”的文类,并将之界定如下:“文人于当时政治状态或社会现象有不满,摹绘以文章,且专著其缺失,则所成就者,常含有攻击政俗之精神。”^{[2]303}之后他进一步完善了谴责小说的定义:“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3]291}鲁迅在此论及了谴责小说的社会功能,即“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以此观之,中国文学从来不缺乏揭露社会弊恶或批判时政的文章,比如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就记载了从汉魏到东晋时期,帝王将相或隐士僧侣的生活轶事,其中不乏对官场生活的揭示与批判。只是古代社会诗歌发达而小说式微,因此谴责小说的历史虽

不起于清末却以清末为盛。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启蒙”之时代主题的确立以及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呼声的兴起,清末谴责小说以及盛极一时的白话市民文学创作逐渐被新文学取代。茅盾改革《小说月报》并用具有新气息的文学取代“鸳鸯蝴蝶派”文学,便是清末谴责小说及其他通俗文学作品步入黄昏的旁证。但新文学的“谴责”功能并没有隐退,代表性事件就是以茅盾、沙汀、吴组缃等为代表形成的“社会剖析小说”创作道路,实际上承接了谴责小说的社会功能,成为左翼文学内部的主要创作潮流之一,树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等到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了文坛,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等创作路向,终于随着经济建设时代的到来而步入了多元化创作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写实小说”创作之风,在当代文学中率先集中揭露了现实生活的权力腐败问题,诸如刘震云的《单位》、陈建功的《前科》、梁晓声的《溃瘍》以及陈国凯的《升官图》等,这些作品围绕政治和权力展开批判。有学者认为:“新写实主义的‘新’,相当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对权力腐败的正视和批判。而在新时期以前,这种批判非常缺乏或几无可能。”^[4]这句话传递出两点重要信息:一是新写实小说何以为“新”?无非是内容上对权力腐败的重视;二是新写实小说开创了当代文学权力批判的先河,是谴责小说在当代复活的开端。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社会冲击着人们既有的价值观念,很多人在社会转型期利用体制的不完善之处,为了私人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而不惜违背伦理道德的制约,有的甚至以身试法,演变为社会动荡和不安的因素,给当代社会带来了隐患。在这些人当中,有政府官员、不法商人、知识分子乃至专业技术人才等,而对他们加以批判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酝酿出中国文学史上新一轮的“谴责”潮流。众多例证如下:1997年首次

出版的张平小说《抉择》，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揭示，也塑造了李高成这样的正义形象，作品2008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张平2004年又推出了《国家干部》，直面当代社会政治的丑恶面影。陆天明于2002年出版的《苍天在上》，是对公款挪用行为的抨击，该作品与《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和《高纬度战栗》并称“反腐四部曲”。阎真2003年出版的《沧浪之水》通过一个医学研究生之眼观看到现实的各种丑态；周梅森2009年出版的《绝对权力》是一部思索权力监督的小说；李彦乔2011年出版的《天怒》是通过权欲去透视官场和商界的“生存法则”。此外，还有钟道新的《单身贵族》、阎连科的《瑶沟人的梦》以及莫言的《白棉花》等，如此丰富的反腐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景，加上这些作品带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即所有的腐败和恶劣行为最终都会被正义法办，既满足了大众惩恶扬善的阅读诉求，又宣扬了主流的价值观念，因此获得了民间和官方的广泛支持，使得清末以来的谴责小说类型在当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空间。

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新时期以来的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与清末时期的谴责小说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始终是在现行社会制度内展开的，所有的矛盾最终也必然会在现行政治法律制度下得到妥善的处理；后者的批判则在根本上动摇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有些问题必须在变革当时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得以解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谴责小说在建构现代民主国家的进程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当代谴责小说却有利于完善现有社会制度。新时期以来的反腐小说和官场小说在针砭时弊上与清末谴责小说相似，虽可视为谴责小说的当下形态，但这些小说程式化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依然没有摆脱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缺点的评价，即艺术手法的贫弱和“供谈笑”的媚俗感。正因为存在这些不足，“反腐

小说、官场小说已然走到了‘夏日里最后的玫瑰’期。张平、陆天明、阎真、周梅森们曾领风骚数几年的状况，恐怕也到了末期”^[5]。

既然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因为创作的局限而走到了末路，那这类小说应该何去何从？很显然，根据现实语境挖掘“丑恶”题材，丰富小说的叙事方法等，方能让当代谴责小说创作再上台阶。

二

正当人们认为新时期以来的“谴责”小说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李洱《应物兄》的问世弥补了鲁迅所言清末谴责小说的不足，更是摒弃了新时期以来反腐小说和官场小说的弊端。作者深入当下生活实际，写出了当代小说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标志着谴责小说创作高峰的到来。

鲁迅曾指出晚清谴责小说的通病：“作者虽时人之一，而本身决不在谴责之中。倘置身局内，则大抵为善士，犹他书之英雄；若在书外，则当然为旁观者，更与所叙弊恶不相涉，于是‘嬉笑怒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挚，感人之力亦遂微矣。”^{[6]116}这实际上是认为晚清谴责小说的作者由于远离谴责之事，所以在叙述风格上缺少社会批评的严肃性，也难以激起读者或批判对象的忏悔之心，文章的内容显得虚假失真，因不够感人而达不到唤起读者改变丑恶现实的目的。比如鲁迅评价《官场现形记》时便说：“其实颇有风影之谈，夸大之事，不为实录，仅足图快意，供谈笑而已。”^{[6]111}这实际上是认为谴责小说沦为了消遣读物，其最大弊端就是批判不力以及情感不挚。李洱的《应物兄》惶惶两卷，读者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学、思想、哲学、戏剧等知识和经验，方能与作者产生共鸣，领会其深邃的思想感情、丰厚的知识积淀和宽广的人文情怀。该作与通俗文学最大的差别是故事性不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人文读物：作者通过“应物兄”串联起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人文知识，甚至包括朴素的民间常识；

打通了多个领域的壁垒,并对很多特殊历史现象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作者采用“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最终架构成了“一个浩瀚的时代星图,日月之行出于其中,星汉灿烂出于其里”^[7]。这样一部作品,既传递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现实困境,又让读者在很多内容上产生共鸣。与此同时,作者对现实生活有细致入微的观察,用十三年时间写了两百多万字,用坏了三台电脑,然后精缩成八十五万字的定稿,使作品在整体上显得厚重沉稳,一扫鲁迅批评清末谴责小说多“嬉笑怒骂”之情和“文意不真挚”之弊。

除内容之外,鲁迅批评清末谴责小说的作者要么是“置身局内”的“善士”,要么是置身“书外”的“旁观者”,反正与谴责的对象隔着一层厚厚的屏障。而李洱先生自2002年发表《花腔》后的十六年时间里,一直在为新作收集素材,更重要的是他有在高校工作的经历,因此写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简直就是驾轻就熟,既置身局内又置身书外,对所写之人和所叙之事既入木三分又旁眼冷视,避免了清末谴责小说创作中作者与主题的隔膜。李洱在后记中简要概括了他创作《应物兄》的过程,在十几年的写作过程中,他不断经历了人世间最刻骨铭心的变故,亲人离世和孩子降生让他在悲喜之间丰富了观察生活的能力,也坚定了他完成此次创作的信心。李洱说他“每天都与书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8]¹⁰⁴²。他十分熟悉作品中的各色人物,进一步证明作者与作品内容之间的亲近关系,保证了所写内容的真实性和感情的真挚性,扫除了清末谴责小说内容失真的弊病。故而从内容和作者两个维度来讲,如果《应物兄》承接了中国小说“谴责”的功能和历史,那它必然是对之前所有作品的超越,弥补了同类小说创作的缺点和不足,标志着中国谴责小说迈入了新阶段。

针对前文所述,从文学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讲,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和反腐小说可

被视为谴责小说的当代形态,其缺点主要是模式化和媚俗化。而李洱的《应物兄》不仅是对鲁迅所言清末谴责小说之不足的规避,而且也是对当代批评小说叙事艺术的突破,走出了谴责小说创作的困境。《收获》杂志在编前语中这样写道:“《应物兄》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7]这句话是对李洱创作艺术的肯定,那《应物兄》在小说艺术的哪些方面具有超越之实呢?李洱在创作过程中大量引用和植入历史知识和哲学思想,甚至添加很多注释来增加内容的可信度和厚重感,这些都是其他小说不具备的特征。李洱在小说叙事上的“另一个特别的贡献”便是塑造了主人公应物兄,他“为叙述带来了便捷通道,让第三人称叙事的全知功能有所收敛,也为进入应物兄的内省活动大开方便之门。旁白、内心想法、不便说出来的意见、不宜发表的评论,无法登台的对话,甚至冷嘲热讽都走上了前台”^[9]。应物兄是《应物兄》这部作品的主角,但他在小说中更多的是充当了叙事者的功能。故事叙述者和小说作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通常是作者通过小说创作的方式来记录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叙述者只是一个叙述学上的功能,一个‘纸面上的存在。’是作者‘偷听’到这个叙述者讲的故事,写到纸上成为叙述文本。实际上这个叙述者是作者创造的作品中的一个角色,一个特殊的人物。”^[10]²⁵因此,叙述者之于故事的讲述具有十分重要的主体性地位,小说作者相对而言倒成了一个机械的记录者,故事如何展开和结束全依赖叙述者的掌控能力,作者不能进入到故事中去发表议论或阐发自我观点,他必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托付给叙述者完成,因而叙述者成了作者在小说中的代言人。李洱正是借助“应物兄”这样一位特殊的角色完成了他的叙事,故应物兄具有叙事学上的功能,也有文本意义上的作用。作为中生代学者,应物兄兼具了专业能力和处事能力的长处,而他处事能力的提高得益于乔木先生的点拨:他只有忍住一些

话不说,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因此很多读者注意到了应物兄的“腹语”,也就是那些他忍住没说出口的话,只有他自己能够听见,那是真实的应物兄;而他说出口的话,则是碍于说话对象和场景的需要做出的调整,有时并不能表达他的真实想法。应物兄具有分裂型的人格,而这种分裂能让他更好地适应现实,但同时也增加了他的痛苦,因为他长期处于“口是心非”的矛盾状态中。

总之,《应物兄》弥合了传统谴责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足,同时在叙事艺术上别出心裁,不愧为谴责小说历史上的优秀作品。

三

除了弥补小说内容和作者叙事能力上的不足之外,《应物兄》在小说题材和批判对象上实现了对以往同类小说的超越。

首先就官员的批评而言,《应物兄》一方面批评了政府部门堕落的官员;另一方面又批评了高校领导和行政人员,这是其他批判现实的小说作品很少涉及的内容。《应物兄》与所有的谴责小说一样,对官场的贪污腐败行为展开批判。栾庭玉是《应物兄》中职位最高的官员,他作为副省长,负责的是教育和科技工作,引进国外专家是省委省政府的大计,因此他对引进程济世到济州大学任教一事十分重视。但实际上,他认真处理此事也怀有自私的想法,“就是跟着程先生多读几本书”,在济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像很多官员那样,栾庭玉对博士学位充满了期待,他也想到某大学“混”个博士文凭,甚至想过要到美国去攻读博士学位;而当听说哈佛大学的程济世要回济州大学任教时,自然就想投奔到程先生门下读书。同时,栾庭玉打着扶持文化发展的旗号会见程济世的弟子黄兴,目的是给自己捞政绩。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背景下,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能将美国黄金海岸公司引入济州,当然是作为副省长的栾庭玉的一大政绩。因此,栾庭玉前前后后为程济世回济州大学奔忙,醉翁之意不

在建设儒学研究院,而是引资发展经济。栾庭玉希望黄兴投资兴建一个济州的硅谷,但黄兴认为美国硅谷的发展是自然形成的,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他没有能力帮助建设好济州的硅谷。栾庭玉却以官员的口吻回答道,这边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让它在哪里形成,它就在哪里形成。并且说,只要加强引导,我相信,济州硅谷肯定会比他们搞得好。而且他认为要把济州的硅谷建得比加州的硅谷还大,不动脑筋地认为建硅谷可以提高周围的地价,增加政府的GDP,何乐而不为呢?实际上,栾庭玉完全违背了硅谷形成的科技和人才环境,单纯地以政府发展指标和调控力为依据去发展新兴产业,以为只要有政府的支持一切都可以发展起来。栾庭玉作为分管业务的副省长,却完全没有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常识,根本不懂得如何去发展地方经济和科技文化产业,全凭“满腔热血”和手中的权力来作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划,最终是投入了资金却没有产出,耗费了精力却没有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属于没有知识素养导致的瞎折腾。栾庭玉在副省长的位置上犯下了很多错误,比如说作风问题、经济问题、工程项目的承包问题等等,后来是妻子豆花举报了他而被“双规”,仕途才算走到了尽头。此外,邓林是《应物兄》中不可回避的官员,他毕业于济州大学,在省政府担任栾庭玉的秘书,他不仅要照顾好“老板”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对他的家人也要体贴入微,成为栾庭玉家人的“保姆”和栾庭玉夫人的“出气筒”,完全失去了自我。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官员和行政人员也逐渐沾染了官僚习气,《应物兄》重点叙述了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现实处境,因此批判的锋芒自然会指向高校“官员”。葛道宏是一位勤勉但精于世故的领导,他作为济州大学的现任校长,具有通过学术振兴高校的决心,于是就有了求贤若渴之志,希望将济州籍的国学大师程济世从哈佛大学东亚系引入济州大学,在国内外兴起儒学热

潮的语境下率先成立儒学研究院。但实际上,葛校长和当今中国高校的大多数领导无异,他们只看重事情的结果和影响,而并不在意学术机构的专业发展和运行机制,有时甚至从个人利益出发,将新单位的筹办过程当作照顾各种人事关系的最佳途径。在公开场合,葛道宏表现出对人才的重视和对官位的漠视。他曾对应物兄说,只要程济世能来济州大学,他愿意将校长职务让给程先生;如果他不愿意被俗务所累,他愿意开全国高校的先河,将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校长手头转交给他。当应物兄说程济世不愿意干这些事务,仅仅是儒学研究院院长一职就“够他当了”之后,葛道宏似乎长长地舒了口气,毫不吝啬地夸他是“真正的大师”,并说“人家有任何要求,我们都要满足”^{[11]131}。全然一副只要不夺他的校长职位,其他一切都好商量的口吻。最后他被迫调离济州大学,到省教委出任副主任,“但保留原来的级别”^{[11]1017}。这表明葛道宏并非被提升而是有问题在身的工作变动,他不能再独当一面,只是保留了行政级别,成为教育系统的“空壳”领导。费鸣作为身在高校的行政干部,有工作能力和才气,但缺少包容和大度的胸怀,凡事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事后睚眦必报。这种性格最终导致他从校办转入研究机构,而作为从一个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行政人员,“当官”成为费鸣之辈的职业追求,他们没有专业老师晋升职称的压力,也没有晋升职称的机会,因此“升官”成为他们“求取功名”的唯一路径。为此,费鸣离开校办到太和研究院,他内心其实是对“副院长”之类的职位充满期待的,而一旦机会丧失,他就显得特别失望,提出辞职就是为了宣泄不满的情绪。

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就是“迎合”。当一方对另一方有所需求的时候,便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取悦对方,以达到自我需求的目的。迎合的处事方式多见于官场中下级对上级的态度,比如《应物兄》中邓林对栾庭玉就是一种迎合的姿态。随着

高校的发展和建设,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成为学术内涵式发展的唯一支架,因此学术大家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很多人对这些名满天下的学者也采用迎合的方式来与之相处,这种“中国式的迎合”也成为《应物兄》谴责的对象。程济世喜欢一种称为“济哥”的蝈蝈,他在与黄兴的谈话中曾提起济哥:“济哥叫,夏天到。我最喜欢听济哥的叫声。放下廊檐下的苇帘遮阳,躲在廊檐下,听济哥叫,真是好听。”^{[11]240}程先生如此喜欢济哥,以至于应物兄不敢告诉他济哥已经绝迹,所以只能寻求生物学专家华学明的帮助。华学明给应物兄搜集整理了济哥的详细资料,并告诉他有些蝈蝈与济哥十分相似,足可以假乱真,问应物兄是否需要,但应物兄不想欺骗程先生。而以葛道宏为代表的济州大学校方为引进程济世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不惜花费重金培植济哥。其实冷静想想,当初程济世说喜欢听济州蝈蝈的叫声,也许只是他对过往岁月的留恋所致,倘若他知道济哥已经灭绝了,再也听不到童年那些济哥的叫声了,他顶多表现出无限的叹息,并不会因此而怪罪济州大学,也不会因此而拒绝来济州大学任教。正如陆空谷诉说:“济州没有济哥了。没了就没了。给程先生解释一下就行了。他就是那么随口一说。老年人,可能扭脸就忘了。我听说,就为了这么一只虫子,你们下足了功夫。”^{[11]751-752}根据记载,最后一只济哥死于1994年,但既然应物兄和葛道宏答应程济世要让他听到济哥的叫声,那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承诺。经过济州大学科研团队的努力,济哥终于重返人间。因此,当陆空谷听葛道宏校长说济哥的研究已经投入五百多万的时候,她反而说道:“葛校长,程先生若是知道,为了他的一个爱好,你们如此兴师动众,会生气的。”^{[11]766}中国人惯于根据自己的喜好猜测对方在意的东西,而不顾对方是否真的需要你这么去做;同时,中国人会竭尽所能去满足和迎合权威人士或官员的意愿,而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这些满足和迎合又恰好符

合权威人士和官员的胃口,于是不惜代价做迎合之事便成为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但这种方式对习惯了美国生活且洁身自好的程济世而言,也许会适得其反,引起程先生的反感。

当栾庭玉说要把济州最好的地方划给程济世建立太和儒学研究院的时候,程先生却说要把研究院建在仁德路,那里是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他要叶落归根。据程先生回忆,程家原来住在仁德路的一个大院子里,正门出去叫仁德路,东门出去是帽儿胡同,胡同里有老字号仁德丸子。程先生对院子里的歪脖子树、梅树、猫以及屋子里的摆设、济哥的叫声等记忆犹新,尤其是对那只青铜美人觚念念不忘,认为那是母亲的陪嫁品。因为程先生喜欢这只铜觚,所以栾庭玉代表省委省政府当面给程先生表态,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找到那只觚。为找到程济世所说的仁德路,葛道宏组织了由不同背景的专家构成的班子来落实仁德路的具体地址,兴师动众的规模不亚于迎接政府领导人的视察。在太和研究院进入施工阶段之前,栾庭玉、葛道宏、应物兄等人对沙盘上的建筑、花草以及各种装饰物进行逐一核查。栾庭玉手握程济世讲话的整理稿,根据程先生的谈话来最后确定研究院的建筑和装修情况,完全是为了迎合程先生的一己之好,于建设儒学研究院而言并无重大意义。

寺庙本是清净无为之地,佛门总是让人肃然起敬。但如今的寺庙早已沦陷于商业大潮之中,寺庙里的和尚也不再以念经吃素为生,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也成为《应物兄》谴责的对象。应物兄虽然与慈恩寺大住持释延长的师弟释延安有过交往,但释延安还是委婉拒绝了他们为黄兴预约敬头香的请求,理由是敬头香需要有敬香权,而此敬香权是公开拍卖的,有时候头香权的费用高达三十七万元。在经济利益面前,慈恩寺的和尚们对头香权没有让步,可在权势和官员面前,他们也不得不低头,当听说黄兴会在栾庭玉副省长的陪

同下来敬香时,释延安态度大为转变。寺庙外的商贩若要进到寺庙内兜售香火的话,必须交“份子钱”;而寺庙自己出卖的黄香每炷高至十万元,最多的时候每天可以卖上百炷香,里面的利润空间之大可想而知,就连美国黄金海岸公司的董事长黄兴也感叹道:“这生意不错。”而小僧们显然经过了培训,有赚钱的自觉意识,对着香客说三炷香不够,要敬九炷香才好,言外之意无非是希望人们多买几炷香,寺庙可以从中多赚一些钱;小僧甚至会劝香客买十万一炷的黄香,并诱导说只有请了黄香的人,大住持才会为他诵经祈福。很显然,在寺庙内的商品买卖上,大住持是“帮凶”和主导者,而有了这样的住持,寺庙里的和尚们还能安心向佛吗?释延安则是个花和尚,他在外吃喝玩乐,完全不顾出家人的清规戒律,而且还影响了年轻人对和尚的价值判断。比如华学明的儿子华纪就以释延安为榜样,认为当和尚可以吃肉喝酒,是一个不错的差事,因此萌生了出家当和尚的想法,幸亏释延源与华学明关系不错,才把他的儿子送回了“人间”,不然孩子未来的道路还不知道该怎么走。皂荚庙修缮之后,本打算让释延安来做住持,但由于他有不雅的视频传到了网上,迫于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住持的职位,回到老家当了佛家最忌讳杀生的杀猪匠。寺庙不再是聚集人们精神信仰的地方,而是成为地方官员或生意人赚钱的由头。雷巴山因为在胡同改造工程中投入了资金,在生意上“分得了一杯羹”,那就是征得栾庭玉的同意,将程先生视为家庙的皂荚庙的改造和管理权控制在自己手中。按照省长的指示,皂荚庙不能按照小庙的规格来改造,而应该建成大寺,斋堂、客堂、钟楼、鼓楼一个都不能缺,而且在庙的后面再修建一个菜园子,可以让外地来的香客体验一下农家乐的味道,完全把寺庙当作了生意场。

林林总总的怪相被李洱先生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使《应物兄》在批判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大大超越了之前的谴责小说,是对当

代社会全景式的打量和批判,无愧为谴责小说创作的高峰之作。

四

李洱曾在高校工作多年,对中国大学教学、学术和学科发展之类的事情异常熟悉。《应物兄》集中批判了中国高校领导在学术建设背后隐藏的腐败行为,以及为求面子工程而施行的急功近利的政策,其批判的眼光更直指高校学术研究的荒诞和学者价值观念的退化。

《应物兄》批判了高校领导以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为幌子来谋取利益的做法。故事围绕建立太和儒学研究院展开,而这项文化工程却为地方官员、商人和高校领导“藏污纳垢”提供了契机。随着儒学的复兴,济州大学本来打算在引进哈佛大学程济世教授的基础上,建立国内首家儒学研究院,应物兄为此不停地忙碌奔走。但从校长葛道宏到分管副省长栾庭玉,再到常务副省长梁招尘,乃至从投资商到学者乔木等,他们都希望借助成立太和儒学研究院的机会,从中为自己捞取利益。凡是出资改造胡同片区和建立儒学研究院的人,均有机会在太和研究院安插一个人工作的特权,这是校长葛道宏的主意,应物兄无力改变,他只能叹息道:“朱楼将起,就把地基给毁了。宴席刚开,老鼠屎就下锅了。”^{[11]732}这个寄托着程先生家国情怀的研究院,寄托着应物兄学术理想的研究院,还没有建成就变成了解决有钱人子女就业的单位,变成了各路人马均可在此工作的大杂烩单位,哪里还有研究机构的学术威严和学术品格呢?除人事之外,很多人通过建立儒学研究院赚足了银子。铁梳子、陈董等对外宣称是倒贴钱来改善济州市容,打造城市建筑的特色,但拆迁居民激烈的反应表明开发商获利不少,智商一般的人都知道,没有钱赚的工程生意人会积极争取接手吗?事实证明,所有的投资者都是借助建立太和儒学研究院而介入了济州城改造的大工程,美国黄金海岸集团、桃都集

团和天津漆皮内裤集团三方共同出资修建太和研究院,他们也因此成立了太和投资集团,为赚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有一次,黄兴、葛道宏、铁梳子和陈董四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开会,学历史的汪居常说他们四个人是在开“分享‘二战’蛋糕的开罗会议”^{[11]750}。此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他们开会的目的自然涉及到太和儒学研究院的建设,但也免不了铁槛胡同开发的利益均衡。

高校很多政策的制定并非发展学术的内需,而是为着应对上级的考评。济州大学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人才引进及留学工作会议”?主要是济州大学在新一轮中国高校排行榜中的位次下降了,所以学校要把下学期召开的“人才引进及留学工作会议”放到这学期末召开,以及时止住下滑的趋势。为什么济州大学的排名会下降呢?主要是排位时加入了新的评价指标:毕业生中的留学生人数、教师出国进修的比例、从国外引进的专家数量。近年来,中国高校的发展围绕着各种评价指标体系在转圈,“国际化”程度成为新一轮高校评比的重要参数,这涉及到各高校师生的留学比例、外国学生和专家来华工作的人数等。一些高校为了“鼓励”教师走出国门,不惜制定各种奖励机制和优待政策,甚至要求评职称的时候必须有出国进修和留学的经历。于是海外高校的教授每年要收到几十上百封邮件,希望能提供访学或进修的机会,使得西方学者将中国高校教师的邮件视为垃圾信件而毫不留情地删掉。中国高校评比的这些指标,真是搞乱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正常秩序,催生了海外高校新的生财之道。因为中国学者出访的人数增加了,一些海外高校专门针对中国人设立了“板凳费”,只要给对方学校交一定数额的“管理费”,中国人便可顺利地得到访学的邀请函。出国访学的中国高校教师,大都徒有其名,真正学到了什么新鲜知识,见识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和人文素养,却不得而知。很多人到了海外,领着国家留学基金委发放的生活补贴,游山玩水或度

假养生,求学的重任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片面追求留学比例对中国学人学术质量的提高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问题。

《应物兄》从学者、论文和项目三个方面出发,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当前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离不开学者主体,但中国目前学者的学术能力和道德观念分化严重,如吴镇这样的人专业知识不强却有较好的活动能力,甚至他能够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江湖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最后谋得学术地位和社会职务。学术论文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应物兄》中专门记载了一篇名为《儒驴》的文章,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把“黔之驴”中的驴与儒家思想联系起来,牵强附会的学术观点令人啼笑皆非。学术项目是学术研究的载体,在当前的学术考评中,学术项目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应物兄》中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科研项目:一是寻找程济世旧居所在地仁德路,这个以历史学家汪居常为带头人的项目团队看起来很专业,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多次修改历史文献、伪造历史文献或利用“旁门左道”的知识,最终得出的结论距离真相十万八千里。但这群人却佯装十分专业和敬业,让旁观者认为他们经过了严密论证和考据,加上权威专家的外衣,由此让人对他们研

究项目的结论深信不疑。另一个科研项目是生物学家华学明主持的济哥再生项目,出于市场经济效益的考虑,雷巴山投注高额科研经费;而当济哥培育成功之后,华学明和济州大学却希望这个项目的成果能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由此提高济州大学的知名度。但实际上,华学明只是找到了济哥的虫卵才羽化出昆虫,并非通过科学手段攻克了世界难题后再生了绝迹的物种,故而实际的科学贡献价值并不大。但由于人们对这个项目成果寄予了太大希望,所以当其他虫卵在自然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纷纷羽化成虫时,旋即宣告了华学明“重大科研成果”的失效,他一下从神坛跌落到地面,精神失常也就在所难免了。

《应物兄》体大虑周,从官场中的官员到高校领导和行政干部,从高校建设中的腐败到学术道德的沦丧,从中国式的巴结迎合到佛门圣地的商业化,李洱用自己独到的观察创作出当代文学史上宏大的谴责小说。而其在叙事艺术和主题拓展方面弥补了鲁迅指出的清末谴责小说之不足,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谴责”类小说困境的突围,为后世谴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应物兄》值得我们仔细阅读和品味。

参考文献:

- [1] 陈大康. 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J]. 明清小说研究, 2004(2): 125-133.
- [2] 鲁迅. 小说史大略[M]//刘运峰,编. 鲁迅全集补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 [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4] 邓玉萍. 新时期反腐文学热的冷思考[J].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2): 106.
- [5] 王艳荣. 也是一个文学话题:从谴责小说到反腐小说[J]. 前沿, 2009(4): 178.
- [6] 鲁迅. 鲁迅小说史大略[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7] 编者的话[J]. 收获(长篇专号), 2018(秋卷): 5.
- [8] 李洱. 后记[M]//应物兄.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9] 程德培. 洋葱的祸福史:从《花腔》到《应物兄》[J]. 收获(长篇专号), 2018(冬卷): 332.
- [10] 赵毅衡. 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
- [11] 李洱. 应物兄[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责任编辑:孔明玉)